

“聖卡特琳娜”號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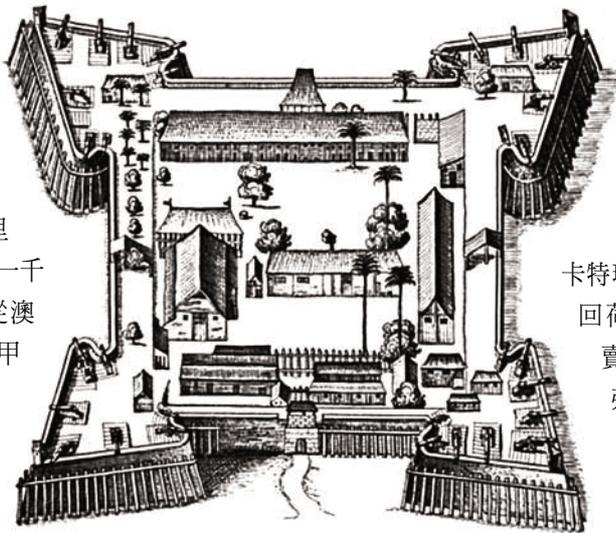
十七世紀初的荷蘭海上擄掠 葡屬印度殖民地及亞洲區域貿易

博希堡*

在參考大量荷蘭語和葡語文獻的基礎上，本文把“聖卡特琳娜”號事件置於盧濟塔尼亞及荷蘭在馬來地區（確切地說是新加坡海峽和馬六甲）的競爭這個更廣闊的環境中，將力圖說明在這個環境下，“聖卡特琳娜”號的被擄導致了葡屬印度殖民地及新生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幾項重要決策的誕生。對葡人來說，來自中國、日本、望加錫和帝汶的船隻的安全問題變得至關重要。除了加固堡壘和擴大艦隊外，他們還為東南亞制訂了一項前瞻性政策，將外交手段與軍事力量有效地融為一體。本文揭示了澳門商人對葡屬印度殖民地的重要性，葡屬印度殖民地的貿易網在東南亞的深入性以及它在擺脫困境方面表現出來的機敏性和堅定性，儘管它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擄掠而多次受挫。

“聖卡特琳娜”號 事件溯源

“聖卡特琳娜”號事件，是17世紀殖民地擴張及國際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懸掛葡萄牙國旗的一千四百噸西班牙大帆船，從澳門出發，經馬六甲（Malacca）和果阿（Goa），於1603年2月25日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遭荷蘭海軍將領雅各·范·海姆斯凱克（Jakob van Heemskerck）的伏擊被擄。⁽¹⁾ 據現存報告，



班達群島砲臺（見康姆林，*Begin ende Voortgang Vande Vereenigde Neerlandsche Geoc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阿姆斯特丹，1646年。

該船載有七百名葡兵、幾十名商人和婦女，可能還有兒童。“聖卡特琳娜”號及所載貨物的損失，給澳門商界以沉重的一擊。“聖卡特琳娜”號被作為戰利品帶回荷蘭之後，貨品遭到拍賣，所得高達三百五十萬弗羅林之鉅。當時這筆鉅款，相當於1602年成立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上繳資金的一半，超過1600年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上繳資金的一倍多。

*博希堡（Peter Borschberg），副教授，現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



“聖卡特琳娜”號事件（近期出版物的提法）⁽²⁾，不僅使研究亞洲的史學家倍感興趣，也為研究政治思想史和現代國際關係理論起源的學者注目。這是因為其影響遠非一艘懸掛葡萄牙國旗的商船被當作戰利品擄獲的問題，而是具有真正廣泛的國際意義。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它是17世紀頭20年中發生的許多事件的基礎。“聖卡特琳娜”號的被擄，是荷蘭以東印度公司或其它法律名義在新加坡海峽、卡里門群島（the Karimons）、佩德拉布蘭卡（Pedra Branca）及雕門島（Tioman Island）南部海域實施的第一起擄掠葡國商船的重大事件。歷史清楚地表明，荷蘭人曾將馬來半島南部海域作為最佳伏擊地點，靜候擄掠從澳門、日本、交趾支那（Cochinchina）、望加錫（Macassar）和婆羅洲（Borneo）過來的盧濟塔尼亞船隻的時機。

“聖卡特琳娜”號事件，不僅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及共和國的攝政官意識到，海盜和掠奪政策可以帶來多麼豐厚的利潤，同時還使他們認識到了葡屬印度殖民地的地理脆弱性。⁽³⁾ 澳門、馬六甲和果阿方面早就意識到，在漫長複雜的葡屬印度殖民地貿易鏈中，新加坡海峽是一個比較薄弱（如果不是最薄弱）的環節。⁽⁴⁾ 但是北歐競爭對手在東南亞島國海域的出現，加上1603年的“聖卡特琳娜”號事件，給葡國總督施加了極大的壓力，迫使他加強海峽安全。如果此舉失敗，那麼葡屬印度殖民地不僅祇能採取守勢，而且還可能被割為兩段，因為祇要荷蘭人控制了新加坡海峽，就可以切斷葡國的交通、貿易和經濟命脈。盧濟塔尼亞的官員們痛苦地意識到，不僅有必要為新加坡海峽制訂一項新的前瞻性政策，而且他們自古柔佛（Johor Lama）崩潰以來享受的太平歲月，已經徹底結束。⁽⁵⁾

新加坡海峽是葡屬印度殖民地海上安全的阿基里斯之踵〔意即唯一致命的弱點〕這個認識，不僅為“聖卡特琳娜”號的被擄提供了直接的歷史條件，還為被公推為“現代國際法之父”的荷蘭律師許戈·赫羅齊厄斯（Hugo Grotius，又名許戈·赫羅特〔Hugo de Groot〕）為該次擄掠進行法律辯護提供了機遇。時年22歲的赫羅齊厄斯寫了一份辯護狀，將海姆斯凱克的武力行為合法化。該次辯護為赫羅齊厄斯提

供了許多機會，如辯論，熟悉與貿易、戰爭、和平、收繳敵國戰利品等相關的法律，訪問世界各地的港埠和商業中心，以及探索國際結盟和締約方面的關鍵要素。這部重要法律文獻，在他生前（1609）祇有一章是以“海洋的自由”（又名“論荷蘭參與印度貿易的權利”）為題匿名發表的，但這部拉丁文獻的主要部分，直到它在19世紀60年代被人重新發現後才聞名於世。⁽⁶⁾ 自那以後，有確鑿的研究證明，這一為“聖卡特琳娜”號事件辯護的法律要件中的相當部分，後來被收進了他1625年出版的《戰爭與和平法三卷》，是為現代學者所知的赫羅齊厄斯對國際法和法理學的最傑出貢獻。

本文從微觀的視域，以馬蒂娜·范·伊特遜（Martine van Ittersum）的最新研究成果為背景，重新追溯“聖卡特琳娜”號事件。伊特遜的精湛研究，被囊括在她2002年向哈佛大學提交的優秀博士論文當中，其精華部分還以論文形式發表在2003年的《亞洲社會科學雜誌》。⁽⁷⁾ 在參考大量荷蘭語和葡語文獻的基礎上，本文把“聖卡特琳娜”號事件置於盧濟塔尼亞及荷蘭在馬來地區（確切地說，新加坡海峽和馬六甲）的競爭這個更廣闊的環境中。本文將力圖說明，在這個環境下，“聖卡特琳娜”號的被擄，導致了葡屬印度殖民地及新生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幾項重要決策的誕生。對葡人來說，來自中國、日本、望加錫和帝汶（Timor）的船隻的安全問題，變得至關重要。除了加固堡壘和擴大艦隊外，他們還為東南亞制訂了一項前瞻性政策，將外交手段與軍事力量有效地融為一體。本文還揭示了澳門商人對葡屬印度殖民地的重要性，葡屬印度殖民地的貿易網在東南亞的深入性，以及它在擺脫困境方面表現出來的機敏性和堅定性，儘管它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擄掠而多次受挫。

“聖卡特琳娜”號事件

1602年，荷蘭海軍將領海姆斯凱克抵達亞洲後，發現那裡貨源匱乏，商業前景差得難以想象。他還瞭解到，有十七名荷蘭水手被澳門盧濟塔尼亞

◁ 1601年班特姆荷葡海戰（版畫：克拉斯·楊斯作，鹿特丹海事博物館收藏）



巴達維亞近海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

當局處死。上述因素使他對葡屬印度殖民地採取了公開敵視的態度。⁽⁸⁾他深信，葡國官員勾結東南亞王公，查封荷蘭商館，沒收荷商貨物，並將那些無照經商的北歐人繩之以法。更重要的或許是，他的進貨努力都付諸東流了。在暹羅灣港市北大年（Patani），其荷蘭同胞范內克（van Neck）搶先一步，將該貿易季節的胡椒現貨訂購一空。

1602年11月16日，海姆斯凱克從北大年揚帆起航，駛向馬來半島東部沿海的雕門島⁽⁹⁾，然後再準備前往年初飽受富爾塔多·德·門東薩（Furtado de Mendonça）將軍武力蹂躪的班達群島（the Banda Islands）。當時正值南海信風季節開始，每逢此時，從澳門和日本開出的葡國西班牙大帆船，就會繞過今越南海岸，穿越檳榔嶼（Pulau Condor）和雕門島之間的暹羅灣，前往新加坡海峽和馬六甲。雕門島這個位置，是北大年女王希瑤（Hijau）和柔佛親王（柔佛國王阿勞丁〔Alauddin〕三世的異母弟弟）向海姆斯凱克推薦的。⁽¹⁰⁾據伊特遜稱，由於海姆斯凱克早先曾與淡目（Demak）首領交涉，釋放了柔佛俘虜並歸還了被扣貨物，因此頗得柔佛王室器重。在17世紀頭幾十年內，這一良好關係為海姆斯凱克擄掠葡國商船鋪平了道路。

海姆斯凱克將船停泊在雕門島近海後，即於1602年12月4日召集全體軍官會議，一致決定襲擊葡國對華貿易船隊。⁽¹¹⁾不管怎麼說，葡萄牙（及西班牙）與荷蘭共和國正處於交戰狀態，而且貨又是那麼難進，連時間也在和這位荷蘭將領及部下作對。

在雕門島海域的等待，超過了原計的二十天。有島民對荷蘭人說，1603年2月18日有一艘葡國大帆船經過。但是海姆斯凱克顯然沒有理會這一情報。後來，一艘過路的柔佛船捎來了更具體的情報。船上的馬來水手說，他們幾天前在公海上超越了一艘葡國大帆船，並建議荷蘭將軍在新加坡海峽等候葡國對華貿易船隊的到來，因為船隻在通過該海峽時必須貼岸航行。在這個位置伏擊葡國商船，顯然要比在雕門島附近的遼闊海面上更為理想。

海姆斯凱克採納了該建議，並於1603年2月24日趕往新加坡島以東的柔佛河口，希望追上那艘帆船。但他被告知，該船已於五天前安然通過了水流湍急的新加坡海峽。不知是巧合還是運氣，次日（2月25日）清晨，海姆斯凱克及部下發現了停泊在海上的“聖卡特琳娜”號。⁽¹²⁾根據現有資料，這艘一千四百噸的大帆船完全處在友船保護之外，成了荷蘭人炮擊的靶子。交火從黎明時始，一直持續了數小時。“白獅”號和“阿爾克瑪”（Alkmaar）號兩艘荷蘭船，採取機智戰術，擊毀了大帆船的風帆，使之無法動彈，卻未傷貨物。有關這一事件的葡國文獻稱，“聖卡特琳娜”號上的葡兵在還擊時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因為船上載着婦女、可能還有兒童、商人和其他平民，因而在遭到砲擊後，船上哀聲雷動，一片混亂。17世紀初的史學家埃曼努埃爾·范·梅特倫（Emanuel van Meteren）還認為，葡船攜帶的武器落後，而荷船設計先進，不僅進退自如，而且暴露在水面上的船體部分很小，不易被擊中。⁽¹³⁾

荷蘭方面的資料強調了這個事實，即在當天的交戰過程中，海姆斯凱克的旗艦上有一位柔佛王室成員。德·布萊（De Bry）1607年出版的《東印度之旅之八》以及弗朗索瓦·瓦倫丁（François Valentijn）的《新舊東印度》，均明確提到，柔佛親王在海姆斯凱克的旗艦“白獅”號上。但在致荷蘭執政官（States-General）及許戈·赫羅齊厄斯的信件中，海姆斯凱克卻稱，他船上坐的不是別人，正是柔佛國王阿勞丁。⁽¹⁴⁾由於柔佛國王在場，所以赫羅齊厄斯後來在對擄掠進行的法律辯護中稱，“聖卡特琳娜”號的被擄，得到了柔佛國王的直接支持和許可。

黃昏時分，葡船已被砲火轟得彈痕纍纍，開始進水。失控的帆船開始向峭岸壁立的海岸漂移。由於新加坡海峽水急浪高，加之暗礁密佈，因此“聖卡特琳娜”號有可能在新加坡島東岸的沿海漂浮。如不及時採取措施，很可能發生船毀貨亡的危險。葡國船長塞巴斯蒂昂·塞勞（Sebastião Serrão）及士兵，在傷亡七十餘人後，最終掛起白旗投降。海姆斯凱克看到降旗，即派單桅小船一艘前往受降。

經談判，帆船及貨物歸荷蘭所有，倖免船員及乘客不受傷害，並允許前往馬六甲葡屬港口，通行無阻。與此同時，船上的貨被卸下，其中相當一部分最貴重的貨物如瓷器、糖、絲綢和珍貴木材如鷹木，被轉到兩艘荷蘭船上。⁽¹⁵⁾

直接後果

現有葡文文件表明，海姆斯凱克確實沒有食言，所有倖存者都被送到了馬六甲。海姆斯凱克把船泊在葡屬島嶼（有一文件稱格蘭德艾蘭，Ilha Grande）沿海後，將塞勞船長和天主教士安東尼奧（António）扣作人質，然後與岸上的盧濟塔尼亞當局交換了一系列信件。在一封1603年3月9日由保羅·門德斯·德·巴斯孔塞洛斯（Paulo Mendes de Vasconcelos）起草、並由馬六甲市政官員簽名的信中，葡國官員顯然按照談判協定，以當時極為罕見、明白無誤的謙遜言辭，對荷蘭將軍的守信表示謝意。履行完感謝儀式後，葡國官員們即向荷蘭將軍獻媚說，他的運氣真好，碰上了這樣一艘從中國來的滿載貴重貨物的大帆船；此船落入敵手，“完全是上帝旨意”⁽¹⁶⁾。

就在3月的當天，馬六甲的葡國水師提督（Captain-Major）費爾南·德·阿爾布克爾克（Fernão d'Albuquerque）致函海姆斯凱克，向他表示感謝，並特別問到他在襲擄“聖卡特琳娜”號時那麼走運的原因。阿爾布克爾克出身貴族，後來官至印度總督。他公開承認，船上的非軍事人員，如婦女、商人和其他“無用人員”（可能指兒童），嚴重干擾了葡船的還擊能力。而海姆斯凱克的運氣還遠非這些，因為他沒有遭遇任何葡國艦隊的船隻。要是讓他碰上了，阿爾布克爾克嚴肅地說，那麼他的艦隊肯定“不容他輕易得手”⁽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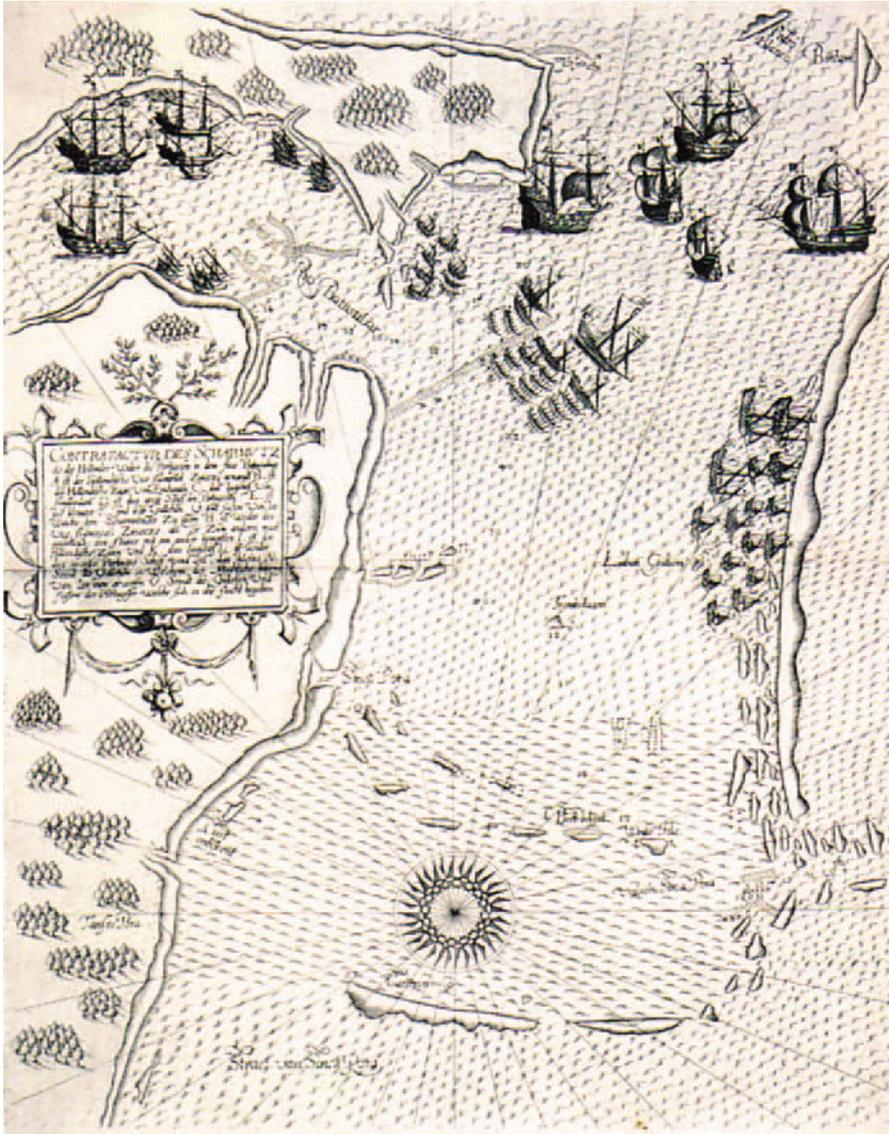
阿爾布克爾克似乎明白襲擊的真正動機，特別是范內克船隊那十七名荷蘭水手在澳門被溺殺的事。他對該事件深表遺憾，並說當時處死他們證據不足。他還強調，當事人已經被捕，等候處決。寫到這裡，這位提督話鋒一轉，請求海姆斯凱克幫

忙。從許多方面來說，他這樣做既不符合該信的語氣，也不符合當時的場合。他請求海姆斯凱克出面向柔佛國王阿勞丁及親王調停，協商釋放被柔佛關押的人質（這些人質是從一艘澳門過來的平底帆船上俘獲的），並准許他們安全抵達馬六甲。從阿爾布克爾克1603年3月26日致荷蘭將軍的第二封信來看，那些被柔佛人以“和平”名義俘擄的“基督教”人質，仍未獲得釋放。阿爾布克爾克提醒海姆斯凱克說，他並不要求柔佛“歸還帆船”和貨物，祇要釋放“葡萄牙及基督教”人質就行。為了給與柔佛王室的談判鋪路，阿爾布克爾克宣稱，他準備將兩名特使交給海姆斯凱克，一名是菲力普·洛博（Philip Lobo），另一名是比特·馬斯卡雷尼亞斯（Pedro Mascarenhas）。⁽¹⁸⁾

當然，德·布萊的《東印度之旅之八》中最令人動容的信，是塞勞船長1603年3月24日致海姆斯凱克將軍的。⁽¹⁹⁾信中反映了塞勞在“聖卡特琳娜”號事件中所表現出的人性及其個人悲劇。塞勞十分遺憾地表示，除了言辭以外，他現在沒有任何東西能報答海姆斯凱克的不殺之恩，因為他已經喪失了一切。他的個人積蓄被悉數用來購貨，而船上的貨物又被擄掠一空。他的唯一所存，便是身上的衣衫。而身上的衣衫，這位破產船長哀歎道，也被砲火燬得祇剩布條。塞勞謙卑地懇求海姆斯凱克送他“一塊氈皮”，以便讓他為自己縫製一件新衣。塞勞表示，他將把這一饋贈看作友誼的象徵，看作施捨，以此來紀念他被俘乃至釋放時的狼狽相。⁽²⁰⁾

滿喇加的報復

據查里斯·博克塞（Charles Boxer）估計，“聖卡特琳娜”號的被擄，使澳門商界蒙受了約一百萬金幣（cruzados）的損失。⁽²¹⁾彌補如此沉重的損失，不僅需要時日，還需要一筆數目不菲的資金。新加坡海峽和馬六甲的安全，歷來就存在問題，沒有少費葡屬印度殖民地的錢財。這兩大航道的周邊地區，大部為柔佛王國掌握。1511年，葡萄牙滅了滿



希歐多爾·德·布萊，柔佛。

喇加國後，柔佛便被馬來諸國視為滿喇加蘇丹國的合法繼承者。出於這種特殊地位，加之其地理毗鄰馬六甲海峽，所以盧濟塔尼亞和柔佛的關係可想而知，就連關係“最好”時，也是非常緊張的。繼“聖卡特琳娜”號事件後，荷蘭在柔佛的存在及其與柔佛的友好關係，對葡國來說，不僅是討厭的，而且還構成了嚴重的戰略和商業威脅，因此必須扼殺在繃襖之中。

1603年初秋，久經沙場的葡軍將領安德雷·富爾塔多·德·門東薩（André Furtado de Mendonça）

接替費爾南·德·阿爾布克爾克，出任馬六甲及其諸侯國的水師提督。富爾塔多·德·門東薩利用“聖卡特琳娜”號事件後葡國政治領導層的更替，向柔佛王國發動了“攻勢”。在外交戰線，葡國馬六甲新班子逼迫國王及其弟弟割斷他們與荷蘭的友好關係。然而葡方的提議，顯然遭到了柔佛王室的拒絕。由於柔佛堅決不肯向馬六甲葡國當局讓步，在南海信風來臨之際，富爾塔多·德·門東薩遂派埃斯特旺·泰謝拉·德·馬西多（Estêvão Teixeira de Macedo）率領一支由約四十艘船隻組成的艦隊，對柔佛河口實施海軍封鎖。⁽²²⁾這次行動的目的大致有二：懲罰柔佛國王，因為他容留荷蘭人，

並同他們合夥掠奪葡國商船；為來自澳門、日本和望加錫的葡船保駕護航。在1603到1604年的新一輪對華貿易季節中，為了不惜代價避免“聖卡特琳娜”號事件重演，馬六甲的葡國官員個個都忙得不亦樂乎。

1603年9月底，荷蘭海軍副將雅各·彼得斯·范·恩克海森（Jakob Pietersz van Enkhuisen）抵達新加坡海峽後，瞭解到葡國實施海上封鎖的情況。應柔佛國王和親王之請，彼得斯向泰謝拉·德·馬西多的艦隊開戰，交火持續了兩天之久。柔佛王室

Descrição chorographica do sitio da
Fortaleza de Muar. fundada por o
Descobridor Manuel Godinho de India.
Anno. 1607.



麻坡要塞，見埃雷迪亞《麻六甲宣言》

以為封鎖就此結束，但他們的高興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等彼得斯和他的三艘軍艦於1603年10月中旬向北大年方向馳去後，葡國艦隊殘部又在新加坡海峽重新集結起來了。⁽²³⁾

根據現有資料，對柔佛河上游城市的封鎖，在1604年初達到了頂峰。富爾塔多·德·門東薩發動的會戰，將古柔佛再次燒為灰燼，是為該城在不到二十年內的第二次被焚。⁽²⁴⁾葡國艦隊繼而向上游的柔佛王宮所在地巴株薩瓦(Batu Sawar)逼近。由於解決安全問題為本次戰爭的最終目的，因此這位馬六甲提督特邀歐亞混血工程師及科學家曼努埃爾·戈丁諾·德·埃雷迪亞(Manoel Godinho de Erédia)同行。埃雷迪亞在此次征戰中，勘察了幾處適宜修建堡壘的地點(其中包括柔佛拉馬)，另外還繪製了幾張新加坡海峽和柔佛河口的詳細地圖。雖然城堡後來並沒有在古柔佛興建，但在葡方的支持下，埃雷迪亞最終在馬來半島西南岸的麻坡(Muar River)河口建了一座，目的據說是為過往船隻提供保護，此外就是鎮守麻坡河入海口，因為它在當時起着跨半島通商大動脈的重要作用。現在，在布魯塞爾皇家圖書館收藏的埃雷迪亞的圖紙中，仍然可以看到這座用木柵而非石頭建造的長方形城堡(像大部分馬來城堡一樣)。⁽²⁵⁾

儘管“聖卡特琳娜”號事件帶來不少挫折，但富爾塔多·德·門東薩對柔佛發動的戰爭以及1604年矗立在麻坡河口的城堡，標誌著葡萄牙在馬六甲地區的地位和聲譽再度確立。但是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卻令馬六甲葡國當局在財力、軍力乃至士氣上捉襟見肘。荷蘭人加強了對摩鹿加(Moluccas)葡國據點的襲擊。1605年2月，安汶島(Ambon)砲臺被北歐“侵略者”攻陷。⁽²⁶⁾馬來群島這一地區經歷的嚴重問題，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在1604至1605年的貿易季節，第一護航分艦隊為甚麼要比往常遲到柔佛河口及新加坡海峽。

馬六甲葡國當局估計荷蘭會進攻柔佛河口，因此於1605年2月底調集所有海軍力量，並派出一支由七艘西班牙大帆船及其他六十艘大小船艦組成的艦隊，由富爾塔多·德·門東薩親自指揮，浩浩蕩

蕩通過新加坡海峽。據史料記載，這位馬六甲提督對戰勝柔佛充滿信心，認為此役必然馬到成功，因而下書威脅柔佛國王及親王。這位提督狂妄地宣稱，如果此役兵敗，他和馬六甲的居民甘願向柔佛國王俯首稱臣，歲歲納貢。這種狂妄自大，也許是在激戰期間表現出來的。雖然沒有人能說富爾塔多·德·門東薩此役兵敗，但他也未能實現自己的基本目的。在消耗大量火藥子彈、遭受重大傷亡之後，葡方放棄了對巴株薩瓦城的圍攻。柔佛首都兵精糧足，戒備森嚴，易守難攻。葡國提督不僅損失了時間，還損兵折將，耽誤了戰機，敗壞了聲譽。巴株薩瓦城的圍而不克，以及葡萄牙在新加坡海峽的存在，未能遏止維吉布蘭德·范·沃維克(Wijbrand van Warwijk)將軍的荷蘭軍艦加強在半島南端及廖內群島(Riau Archipelago)附近的擄掠活動。“弗烈辛根”號(the *Vlissingen*)在佩德拉布蘭卡近海成功俘獲一艘來自交趾支那、滿載大米、紡織品、鷹木、樟腦、安息香及六門大砲的葡國商船。荷蘭在上述水域虜獲的戰利品，還包括一艘馳往馬六甲的滿載給養的平底帆船，以及一艘從帝汶附近的索洛島(Solor)開出的、載有16.7公噸白檀木和海龜殼的小船。⁽²⁷⁾

“聖安東尼奧”號事件

本貿易季節葡國商船隊蒙受的最大損失，當屬“聖安東尼奧”號無疑。這艘大帆船和另一艘若昂·卡亞多·德·甘博亞(João Caiado de Gamboa)旗下的、1604年11月從葡控日本港口平戶(Hirado)起航、據說“滿載”白銀的商船同行。該批白銀為是年在日本銷售絲綢所得，不僅為1604年的貿易帶來了“豐腴的利潤”，而且還可以沖抵兩年前“聖卡特琳娜”號被擄遺下的大部分債務。為了確保能夠平安通過水急浪高、海盜猖獗的南海、新加坡海峽及馬六甲海峽，這兩艘商船由一艘葡國武裝大帆船保駕護航。⁽²⁸⁾

據現存葡荷文獻記載，由於商船隊途中遭遇風暴襲擊，“聖安東尼奧”號在佩德拉布蘭卡沿海

失去尾舵，遭到重創，幾乎無法操縱。1605年2月17日，“聖安東尼奧”號駛入暹羅灣港埠北大年。其餘船隻（包括卡亞多·德·甘博亞的那艘滿載白銀的商船和葡國武裝護衛艦）繼續航行，最終平安抵達馬六甲。而“聖安東尼奧”號則留在北大年港修理。對盧濟塔尼亞商人持友好或至少中立態度的北大年女王希瑤及其朝臣，自1602年後開始對他們惡眼相看。女王准許范·沃維克將軍扣押停泊在北大年港的失事船隻“聖安東尼奧”號。1605年3月26日，當船員們得知自己的命運後，首先表示要捍衛商船及貨物，直到最後一滴血。然而晚船長、大副被接上岸後，“聖安東尼奧”號及其貨物（估價約八萬金幣）便落入敵手。荷蘭人兵不血刃就奪得該船。⁽²⁹⁾

在1603-1605年期間，盧濟塔尼亞商船隊的“聖卡特琳娜”號、“聖安東尼奧”號及其它商船在新加坡與離門海域遭遇的命運，與荷蘭公司最大限度地掠奪葡、西財物並破壞他們的貿易網的目標暗合。擄掠和搶奪——即在戰爭法的庇護下，在可能的前提下，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襲擊並奪取（最好是盧濟塔尼亞的）商船，不僅扭轉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長期虧損，而且其範圍之廣，意義之深，遠非某些研究荷蘭公司的現代史學家敢於承認。“聖卡特琳娜”號及“聖安東尼奧”號事件，用現代媒體術語來說，是“頭條新聞”，天下盡知。但其它許多事件，而今已被湮滅。維克多·恩托文（Victor Enthoven）在其極富創見的研究《澤蘭省與荷蘭共和國的崛起》一書中估計，僅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頭二十年內，就有不同國家的大小船隻一百五十到二百艘在東印度地區遭襲擄。⁽³⁰⁾這個數目無論如何計算，都是很可觀的！

1605年不僅目睹了安汶島陷入荷蘭之手，還見證了盧濟塔尼亞商船隊有史以來的最大損失。富爾塔多·德·門東薩哀歎道，馬六甲和澳門商界面臨的苦難，可謂是一眼望不到頭。當然，葡國也有自己的情報網，向他們報告該地區的可疑動向。據柔佛朝中的同情者——如宰相和水師都督——密報，柔佛計劃與荷蘭在馬六甲發動一場聯合攻勢。葡荷

牙人做了最壞的打算，1605年年底，就已經開始加固馬六甲要塞，嚴陣以待新的圍攻。次年，荷蘭將軍康內利斯·馬特烈夫·德·容（Cornelis Matelieff de Jonghe）抵達馬六甲地區，圍攻即告開始。⁽³¹⁾

該地區的澳門和馬六甲貿易網，同樣加強了戒備。保羅·平托（Paulo Pinto）在其著作《葡國人和馬來人》中稱，自1606年初（即從“聖安東尼奧”號事件後的新一輪對華貿易季節開始），馬六甲就在半島水域加強了巡邏，保護來自澳門的船隻。⁽³²⁾這些高度警戒措施，主要集中在擄掠的熱點區域，如新加坡海峽、佩德拉布蘭卡及離門之間的海域。

儘管有了上述保護來自中國與日本的商船的措施，到1606年初，馬六甲的商業熱情已經降到了危險的地步。據保羅·安東·蒂勒（Paul Anton Tiele）引證當年2月的一封信稱，“一位從舊港（Palembang）到馬六甲的馬來商人”說，馬六甲城裡幾乎“不見葡兵蹤影”，“約有兩百多軍人”被派到了柔佛河口。他進一步強調說，馬六甲居民因畏懼擄掠成性的英國人而不敢出海。也許他把荷蘭人誤作英國人了，或者他根本就無法分辨荷蘭人及英國人。但是，在這座盧濟塔尼亞控制的城市中，商業氣氛的確十分低迷，外國商人紛紛離去，馬六甲居民也無心經商，靠種地來勉強維持生計。⁽³³⁾

結語

由於1606年荷蘭進攻馬六甲未克，馬來半島及周邊地區的歐亞列國關係，以及他們和澳門的貿易往來，又依舊制大體延續了三十五年。到1640年左右，葡國在澳門的貿易地位才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這是因為繼1639年葡國失去了日本市場之後，馬六甲次年又落入荷蘭之手的緣故。

繼“聖卡特琳娜”號事件後，新加坡海峽成了荷蘭人擄掠從日本及澳門開來的葡國商船，或實施海軍封鎖，切斷馬六甲與澳門所有貿易聯繫的主要地點。葡人對這些挑戰迅速做出反應，開闢了新的陸



路和海上貿易線路。埃雷迪亞在麻坡河口建造的城堡，不僅起到了監視馬六甲海峽航運活動的作用，還明顯保護了跨半島的貿易線路。這條線路沿麻坡河及彭亨河(Pahang)的支流而上。由於兩河在內地縱深之間祇隔一塊狹窄陸地，平底小船可以從一條河經這塊陸地“拖”(或確切地說“搬”)到另一條河裡。⁽³⁴⁾每當荷蘭軍艦在新加坡海峽搜索時，駐守雕門島的葡國情報員就會及時向盧濟塔尼亞船長及商人發出信號，後者便立即將貨船開進彭亨港，並在那裡卸貨，再轉運麻坡河。當然，這種安排需要彭亨朝臣的通力合作。葡國人不僅大力拉攏彭亨官員，還努力與他們的兩個鄰國——柔佛-廖內帝國及北大年——搞好關係。後者在17世紀初，被彭亨國尊為“老大”。

為了避開新加坡這個瓶頸，葡國人還在連綿不絕的廖內群島中成功地開闢了新航線，從而使商人得以避開荷蘭人定期在海峽及其周圍實施的海軍封鎖。這些新航線中最重要的一條，據說是1633年由

佩德羅·貝爾托洛(Pedro Bertolo)發現的，現仍可在“聖母之路”(Derrota de N. Senhora de Conceição)之類的地圖上找到。⁽³⁵⁾這條海路繞過了位於傳統的新加坡海峽以南的賓坦(Bintan)、加朗(Galang)、倫邦(Rempang)及萬丹(Batam)南部海岸。下面一段從荷蘭語寫成的《巴達維亞日誌》1633年4月17-22日條節譯過來的文字，生動地描述了澳門商人的果敢，以及被荷蘭艦隊追趕的危險，還有尋找可靠的導航將船隻帶過險象環生的廖內群島的必要性：

“我方從一個賓坦島的馬來人處得知，四艘來自澳門的葡船，因畏懼我軍巡邏快艇，不惜鋌而走險，進入了賓坦周圍的島嶼及急流險灘。得到這一情報，我軍立刻舟楫齊發，到上述島嶼及險灘追擊葡船，並以該馬來人為嚮導，因他不僅熟知上述島嶼及險灘，且其父(葡人嚮導)答應拖延時間，俾使我艦趕上葡船。(……)發現我艦逼近後，葡船意識到無力抵抗我艦，遂放火焚船。船上載着各種可燃物資及火藥，因此除現金以外，未能搶出其它貨品。四艘葡船烈焰衝天，我軍將士及上述諸島土著(多靠打劫船隻，掠奪財物維生)，均無法撲救。”⁽³⁶⁾

在外交戰線，葡國在柔佛-廖內國取得了一系列勝利。盧濟塔尼亞與荷蘭在柔佛的競爭將宮廷權勢一分为二，國王及親王支持荷蘭，而宰相和水師都督則偏向葡人。馬六甲當局成功地利用了荷蘭人暫時未與柔佛結盟的弱點，加強了與王室的聯繫，並於1610年10月與柔佛締結了和平條約。然而早在1606年，荷蘭圈子裡就盛傳說盧濟塔尼亞與柔佛的和平條約即將達成。⁽³⁷⁾雖然該條約引起了果阿總督魯伊·洛倫索·達·塔福拉(Rui Lourenço da Távora)的不快，儘管亞齊國(Aceh)入侵柔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將它從葡國的利益軌道上清除出去，但兩個鄰居的關係並不像許多資料(特別是荷蘭資料)要求現代讀者所相信的那樣糟糕。17世紀20年代，荷屬巴達維亞不得不提醒其柔佛盟友，要求它不要與葡屬馬六甲進行太多的貿易。1620年，當有消息說荷蘭大型艦隊即將抵達這個舉

世聞名的貿易和香料城市時，馬六甲的市政官員立即向柔佛國王進獻了黃金七百二十五公斤（成色未詳）用以購買或“租用”他的所有大砲。這一插曲足以表明，葡屬馬六甲與柔佛“做生意”時，信心十足，然而對馬六甲來說，這番美意卻被不幸地拒絕了。⁽³⁸⁾

最後，荷蘭在新加坡海峽及鄰近水域持續不斷的擄掠，幾乎完全割斷了澳門與其它葡屬印度殖民地的聯繫。如此一來，誠如羅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在其極富創見的論文〈澳門經濟發展概要：約1557至1640年〉中所言，飛地裡的商人就被迫在更大程度上依賴對日貿易了。⁽³⁹⁾當“日出之國”於1639年對葡國商人關上大門後，澳門商界便面臨着重構自己的前景。我們從後來的歷史中得知，他們迎擊了挑戰，並取得了成功。

【註】

- (1) 參見珍本 *Corte ende sekere Beschryvinghe*。本文參考了阿姆斯特丹大學圖書館的精裝本。此珍本扉頁有海姆斯凱克的三艘戰艦轟擊“聖卡特琳娜”號場面。
- (2) 參看克魯斯，1991年，頁57-60。
- (3) 關於“聖卡特琳娜”號事件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初期制定“擄掠戰略”中所起作用請參看費恩，2000年，頁190-191。
- (4) 特別參看博希堡，2003年b，頁55-88；欲知一般情況，參見邁林克-魯洛夫斯，1962年，頁60-170。
- (5) 特別參看盧斯，1952年，頁462，1607年2月27日〈會議記錄〉；洛巴托，1999年，頁200。關於攻克柔佛拉馬事宜特別參看迪歐戈·德·庫托，1903年，頁123等。
- (6) 許戈·赫羅齊厄斯，《海洋的自由》，又名《論荷蘭參與印度貿易的權利》。該論著1609年匿名發表後，1625年遭到塞拉凡·德·弗雷塔斯抨擊。弗雷塔斯的論著題為《論葡萄牙的合法亞洲帝國》，赫羅齊厄斯認為該論學識豐富，值得一駁。弗雷塔斯論著的現代拉丁-葡語雙語版見：弗雷塔斯，1983年。
- (7) 參見伊特遜，2003年。
- (8) (9)(12)關於此次事件的背景知識，參見蒂勒，1882年，頁192-196；頁196；頁196。
- (10) (11) 伊特遜，2003年，頁518；頁520。
- (13) 梅特倫，無日期，對開本，頁148正面。
- (14) 德·布萊，1607年，頁86；赫維，1885年，頁128；赫羅齊厄斯，1964年，頁203。
- (15) 參見伊特遜，2002年，頁51等；同時參見蒂勒，1882年，頁196。
- (16) 參見赫羅齊厄斯，1964年，頁385。
- (17) (18) (20) 赫羅齊厄斯，1964年，頁385；頁386；頁387。
- (19) 此信和其它信件見赫羅齊厄斯《捕獲繳獲法》英文版之德文附錄。
- (21) 博克塞，1948年，頁50。
- (22) 布萊，1607年，頁78；康姆林，1646年，第二卷，頁23；蒂勒，1882年，頁217-220；赫維，1885年，頁128-129；索薩，1930年，第一卷，頁554；庫拉斯，1965年，頁506。
- (23) 欲知此事詳情及其歷史背景，參看博希堡，2003年a，頁157-175；蒂勒，1882，頁220。
- (24) 維爾肯，1930年，頁58。布萊烏，1663年，頁202有類似敘述；科爾特索、莫塔，1960年，第四卷，頁41。
- (25) 參看埃雷迪亞，1882年，對開本，頁61反面；科爾特索、莫塔，1996年，第四卷，頁412；法魯，1955年，對開本，頁6正面；埃弗拉特，2001年，頁55；洛巴托，1999年，頁352。
- (26) 雅各斯，1985年，頁604；洛巴托，1999年，頁349、357。
- (27) 赫維，1646年，第二卷，頁83。
- (28) 博克瑟、巴斯孔塞洛斯，1989年，頁56；康姆林，1646年，第二卷，頁83；洛巴托，1999年，頁353；特普斯特拉，1938年，頁24-26。
- (29) 容，1865年，第三卷，頁25；蒂勒，1882年，頁238-239；赫維，1885年，頁130-131；恩托文，1996年，頁201。
- (30) 恩托文，1996年。
- (31) 關於荷蘭語經典資料，特別參見康姆林，1646年，頁15；達姆，1931年，第二卷，第一部分，頁328等；弗朗索瓦·瓦倫丁的譯文見赫維，1885年，頁132-138及蒂勒，1884年，頁59-68；有關此役的葡文資料參看外國歷史研究中心，第二卷，頁259；平托，1997年b，頁122。
- (32) 平托，1997年a，頁122-123。
- (33) 蒂勒，1882年，頁229。
- (34) 根據埃雷迪亞1602年繪製的地圖，帕納里卡（Panarica）位於艾歐姆泊（Iompol）和薩廷（Sartin）兩鎮之間。參看科爾特索、莫塔，1996年，第四卷，頁411。
- (35) 見科爾特索、莫塔，1960年，第五卷，頁578 佚名地圖（約1650年繪）。另一由安德雷·佩雷拉·多斯·賴斯繪的類似地圖現為鹿特丹亨德里克王子海事博物館收藏。
- (36) 科倫布蘭德，1898年，頁162-163。引文為本人從荷蘭語翻譯。
- (37) 內徹，1870年，頁24、27-29；蒂勒，1886年，頁129；特普斯特拉，1938年，頁28。不幸的是，1610年條約的文本失蹤了。同時參見薩爾達尼亞，1997年，頁371。
- (38) 參見安德里恩·范·達森1620年12月27日寫的信，收錄在庫拉斯，1919-1954年，第七卷A，頁686。
- (39) 普塔克，1988年，頁171-172。

【參考書目】

- (Anonymous). 1604. *Corte ende sekere Beschryvinghe vant veroveren der rijcke ende gheweldighe krake, comende uytet gheweste van China, door den Admiraal Jacobus Heemskercke liggende met twee schepen voor de Straet of Fretum de Malacca, vanden Coninc van Ior een vyant der Portugesen opgehouden ende ghebeden sy gheweest, hy soude met zijn scgepen op een rijcke ende wel geladene Portugaloise krake die dry jaran tot Makauw en int gheweste van China om syne Waren inne te nemen gelegen hadde, wachten.* Ghedruckt na de copy van Middelborch by Richard Schilders.
- Blaeu, Johannes. 1663. *Onzième volume de la Geographie Blauiane contenant l'Asie qui est la IV partie de la terre.* Amsterdam: J. Blaeu.
- Borschberg, Peter. 2003a. "A Luso-Dutch Naval Confrontation in the Johor River Delta, 1603,"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53 (1).
- Borschberg, Peter. 2003b. "Portuguese, Spanish and Dutch Plans to Construct a Fort in the Straits of Singapore, ca. 1584-1625" *Archipel* 65:55-88.
- Boxer, Charles Ralph. 1948.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Boxer, Charles Ralph, and Vasconcelos, Frazão de. 1989. *André Furtado de Mendonça, 1558-1610*. Macao: Fundação Oriente and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 Bry, Johann Theodore de, and Johann Israel de Bry. 1607. *Indiae Orientalis Pars Octava: Navigationes Quinque. Primam a Iacobo Neccio ab anno 1600 usque ad Annum 1603, Secundam a Iohanne Hermanno de Bree ab anno 1602 usq. ad Annum 1604; Tertiam a Cornelio Nicolai Annis quatuor; Quartam a Cornelio de Vena, duobus Annis; Quintam, sub Staphano de Hagen tribus Annis in Indiam Orientalem susceptas & peractas continens ...* Frankfurt /M., Ex officina typographica Wolfgangi Richteri.
-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2. *Documentação Ultramarina Portuguesa*, Vol. II.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 Colenbrander, H. T., ed. 1898.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tes als over geheel Nederalndts-Indie Anno 1631-1634*.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Commelin, Isaac. 1646. *Begin ende Voortgang Vande Vereenigde Neerlandsche 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4 vols. Amsterdam: no publisher.
- Coolhaas, W. Ph. 1965. "Een bron van het historische gedeelte van Hugo de Groot's De Jure Praedae," *Bijdragen en Mededelingen van het Historisch Genootschap*, 79.
- Coolhaas, W. Ph., ed. 1919-1954. *Jan Pietersz Coen: 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ë*. 9 volume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Cortesão, Armando, and Mota, Avelino Teixeira da. 1960.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Lisbon: no publisher.
- Couto, Diogo do. 1903. *Vida de D. Paulo de Lima Pereira*. Lisbon: Escriptorio.
- Cruysson, Dirk van der. 1991. *Louis XIV et le Siam*. Paris: Fayard.
- Dam, Pieter van. 1931. *Beschryvinge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dited by F. W. Stapel.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Enthoven, Victor. 1996. *Zeeland en de opkomst van de Republiek. Handel en strijd in de Scheldedelta, c.1550-1621*. Leiden: Proefschrift.
- Erédia, Manoel Godinho de. 1882. *Malaca L'Inde Méridionale e le Cathay. Manuscrit original autographe de Godinho de Eredia appartenant à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de Bruxelles*, reproduit en fac-simile et traduit par M. Léon Janssen, Bruxelles: Librairie Européenne C. Muquardt.
- Everaert, John. 2001. "Erédia: Humaniste ou Aventurier?" in 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 *Suma de Árvores e Plantas da Índia Intra Ganges*, edited by J. G. Everaert, J. E. Mendes Ferrão and M. Cândida Liberato. Lisbon: 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ientos Portugueses.
- Faro, Jorge. 1955. *Godinho de Erédia, cosmógrafo*. Lisbon: Instituto de Alta Cultura.
- Freitas, Frei Serafim de. 1983. *Do Justo Império Asiático dos Portugueses*, 2 vols. Lisbon: Instituto Nacional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 Grotius, Hugo. 1609. *Mare Liberum sive de iure quod Batavis competit ad Indicana commercia dissertatio*. Leiden: Ex officina Ludovico Elzevirii (this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anonymously).

- Grotius, Hugo. 1964. *De Jure Prædæ Commentarius.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A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1604*, translated by G. L. Williams and W. H. Zeydel. New York: Oceana Publishing.
- Hervey, D. F. A. 1885. "François Valentyn's Account of Malacc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traits Branch 16(1):119-138.
- Ittersum, Martine van. 2002. *Profit and Principle: Hugo Grotius,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and the Rise of Dutch Power in the East Indies, 1595-1615*.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Ittersum, Martine van. 2003. "Hugo Grotius in Context: Van Heemskerck's Capture of the Santa Catarina and its Justification in De Jure Praedae (1604-1606)."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31(3): 511-548.
- Jacobs, Hubert. 1985. "The Portuguese Town of Ambon, 1567-1605," in *Segundo Seminário Internacional de História Indo-portuguesa: Actas*. Luís de Albuquerque and Inácio Guerreiro, eds. Lisbon: 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Tropical, Centro de Estudos de História e Cartografia Antiga.
- Jonge, J. K. J. De. 1865. *De Opkomst van het Nederlandsch Gezag in Oost-Indië*, Vol. II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Lobato, Manuel. 1999. *Política e Comércio dos Portugueses na Insulíndia. Malaca e as Molucas de 1575 a 1605*. Macao: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 Luz, Francisco Paulo Mendes da. 1952. *O Conselho da Índia*. Lisbon: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 Meilink-Roelofs, Marine-Antoinette Petronella. 1962.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Meteren, Emanuel van. n.d. *Commentariën ofte Memoriën van den Nederlantsen Staet, Handel, Oorloghen ende Gheschiedenissen van onsen tyden, etc.*, Vol. II. Gedrukt op Schotlant buyten Danswijck by Hermes van Loven.
- Netscher, Ernst. 1870. *De Nederlanders in Djohor en Siak*. Batavia: Bruining & Wijt.
- Pinto, Paulo Jorge de Sousa. 1997a. *Portugueses e Malaios. Malaca e os Sultanatos de Johor e Achém, 1575-1619*, Lisbon: Sociedade Histórica da Independência de Portugal, 1997.
- Pinto, Paulo Jorge de Sousa. 1997b. "Melaka, Johor and Aceh: A Bird's Eye View over a Portuguese-Malay Triangular Balance," in *Nouvelles Orientations de la Recherche sur l'histoire de l'Asie Portugaise: Actes du Colloque, Paris, 3-4 Juin 1994*. Paris: Fondation Calouste Gulbenkian.
- Ptak, Roderich. 1988. "An Outline of 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circa 1557-1640."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XXIXth Con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Tilemann Grimm, Peter M. Kuhfus and Gudrun Wacker, eds. Tübingen: Attempto Verlag.
- Saldanha,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1997. *Iustum Imperium. Dos Tratados como Fundamento do Império dos Portugueses no Oriente: Estudo de História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 do Direito Português*. Lisbon: Fundação Oriente.
- Sousa, A. Botelho e. 1930-1956.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Militar-Marítima da Índia*, 4 vols. Lisbon: Imprensa da Armada.
- Terpstra, Heert. 1938. *De Factorij der Oostindische Compagnie te Patan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Tiele, Pieter Anton, ed. 1886. *Bouwstoff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rs in den Maleischen Archipel*. Vol. 1,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Tiele, Pieter Anton. 1882. "De Europeërs in den Maleischen Archipel," Part VI,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Vol. 30: 141-242.
- Tiele, Pieter Anton. 1884. "De Europeërs in den Maleischen Archipel," Part VII,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Vol. 32: 59-68.
- Veen, Ernst van. 2000. *Decay or Defeat?: An Inquiry into the Portuguese Decline in Asia, 1580-1645*. Leiden: Research School of Asian, African and Amerindian Studies.
- Verken, Johann. 1930. "Molukkenreise 1607-1612", in *Reisebeschreibungen von Deutschen Beamten und Krieglern im Dienst der Niederländisch West- und Ost-Indischen Kompanien, 1602-1797*, Vol. 2. S.P. L'Honoré Naber, ed.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郭頤頓譯